

经济学反思

新冠疫情对一个包含了公民社会和社会规范的全新政策制定基准进行了检验

塞缪尔·鲍尔斯和温迪·卡林

在新冠疫情期间，许多工种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例如，在养老院、超市、配送仓库等——但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它们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在新冠疫情危机暴发期间，低收入群体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上升。雇主要求他们冒着自己与家人感染的重大风险继续在肉联厂、餐馆工作，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辞掉赖以谋生的工作。

这些痛苦的抉择反映了疫情所造成的间接伤害。这种情况引发了道德上的不适，甚至蔓延到了经济学领域，迫使其面对平日宗教领袖和哲学家所关注的伦理问题。与环境危机一样，新冠疫

情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如今的市场失灵已是常见现象而非个例，标准的经济模型早已不合时宜，与大萧条期间民众长期大量失业是当时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劳动力市场可以平衡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消除社会上的失业现象——所造成的影响如出一辙。

新冠疫情过后，受此影响，我们不仅在专题研讨会、政策智库内部看待经济、公共政策的方式会发生转变，老百姓谈论生计与前途时的日常用语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学生们今天关心的问题，预示着未来全新经

图1

济学范式的可能模样。2016年至2020年间，我们邀请了来自18个国家的9032名学生参加一项问卷调查，在学习经济学入门课程前，请他们指出当今社会的经济学家应该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见图1）。

他们的回答如上图所示；字体大小表示回复的频率。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认为，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和失业问题是2016年至2020年全球社会关心的头等大事。在全球各所院校的经济学专业课程设置里，新基准模型的身影越来越常见，这为关心社会不平等、气候变化和失业等问题的年轻人继续攻读经济学带去了希望。

单纯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根本无法转变人们的观念和政府的政策。凯恩斯主义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的成功都在告诫我们这一点，当我们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整合到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道德框架中时，它就会成为一股推动变革的力量，这种现象可以用典型的政策创新来加以说明，也可以在日常会话中得到阐述。

例如，建立在政府承诺维护秩序、保障平等尊严、提倡反家长式自由和功利主义之上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具有市场竞争、分工、专业化特征的经济模式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古典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特征包括自由贸易和反垄断政策。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曾对女王耳语道：“每个人管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简单一句话，就道出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真谛。

近来新提出的经济学范式，也需要建立在价

值互补与经济模式协同作用的基础上。

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而言，通过政府计划、工会谈判减少经济不安感，增加不富裕人群的收入等手段还需要辅以一系列有关储蓄行为、自动稳定器、总需求等组合拳。凯恩斯主义范式的连贯性和修辞力量都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凯恩斯主义范式的倡导者追求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组织实现平等主义价值观来提高社会产出，稳定就业，改善总体经济表现，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范式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同样，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也提出了两个规范性支柱。第一是拥有不受政府胁迫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以扩张性的形式定义的“做什么事的自由”，也不是指在私人和公共领域不被某力量支配）。第二个是程序正义观点，该观点认为只要游戏规则公平，无论结果是否平等，都符合公平原则。一种结合了新自由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人本身都是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的、不道德的，体现在人在经济活动中互动时的表现；也即指，人们在完全契约条件下通过竞争市场互换利益时的表现。完全契约可以保障市场不因疫情蔓延、温室气体排放等“溢出效应”或“外部效应”失灵，它涵盖了利益交换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只是利益互换方。

将“自私经济人”这一假设扩展至公共领域，会为新自由主义赋予一个全新的公共选择学派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政府与工会等其他集体行为体只是特殊的利益团体，它们的目的是利用稀缺

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告诫我们，人既不是全知全能的，也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他们受“道德情操”和“物质利益”驱动。

资源尽可能多地瓜分利益。在这种经济模式下，我们基于哲学所提倡的限制政府权力的观点，对运转良好的经济体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这些价值观和模式综合体现在教育券（允许择校）、负所得税（用政府直接支付现金的方式取代减贫计划）等典型的政府政策中，也体现在诸如“无为而治”的文化基因中。

但是，仅仅依靠整合经济模式和道德价值，使其相辅相成，无法保障一个范式取得成功：要使所提倡的政策奏效，经济模式必须是实证经济的合理近似。大萧条之后，经济现实不断变化，古典自由主义也因此消亡，凯恩斯主义范式同样受到了上世纪70年代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也称作滞胀）的双重挑战。类似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市场解除管制，危机过后，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幻想进一步破灭。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气候危机以及现在的新冠疫情，人们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越来越失望。

作为新范式的一个要素，新基准经济模式必须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明确立场，比如：作为社会制度和生物圈组成要素的经济是怎样的；我们如何做好老百姓的经济人和决策者；我们之间开展互动所需遵循的重要制度是什么；支撑我们生活的相关技术的特点是什么。研究人员在工作时运用到的以及研究生需要正常学习的当代经济学，从各个维度上，对这些问题一一做了回应。

根据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的观点，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义革命告诫我们，人既不是全知全能的，也不是完全自私自利的，他们受“道德情操”和“物质利益”驱动。这些道德情操包括尊严（不愿意被他人所利用）、道德信念、关心他人。这其中既有利他和互惠，也有狭隘的偏执

和种族敌意。

经济学描绘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也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现在认识到，大多数契约都不是完全契约。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开创的信息经济学，在过去40年里得到了极大扩展，它奠定了当代经济学的基础，哈耶克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合约方都不可能在一份可执行的合同中规定完所有重要事项。

在合约条款中，我们无法针对给他人造成的影响作出规定，这是一种惯例而非特例。不仅包括常见的影响我们与生物圈互动的市场失灵，比如污染问题，还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市场：劳动力市场、信贷市场和信息市场等，都属于这种情况。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上，员工和雇主都非常关心工人工作的认真和努力程度。但我们没有办法在合同中强制执行或者明确规定这一点。在信贷市场上，还款承诺可以写入合同，但可能无法强制执行。

合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合约不完全，通常也会出现供应过剩或需求过剩问题。例如，雇主向工人支付的工资高于工人可以选择的其他雇主。这就给工人提供了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工人租金，也意味着，工人拥有这份工作会比没有这份工作生活的更好。租金就成了工人的主要动机，他们会因为害怕失去租金，而听从雇主的安排，卖力地工作，而不是自我孤立。如果失去工作的代价高昂，那么社会上肯定会有愿意接下这份工作的潜在求职者，也就是失业人员。

在这些互动中，价值交换过程在一定程度上由合约、社会规范（例如，员工的职业道德或者借款人如实说明情况等）、雇主或信贷市场的贷款人行使权力三股力量共同约束。80年前，罗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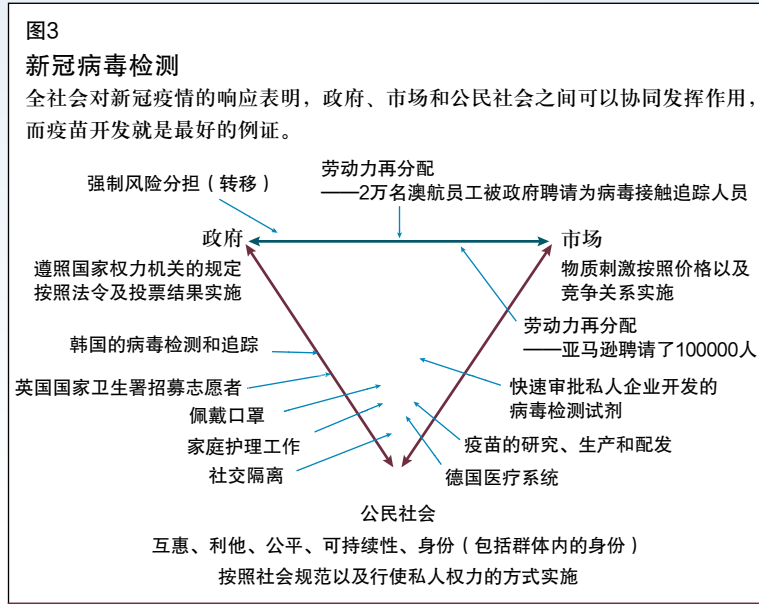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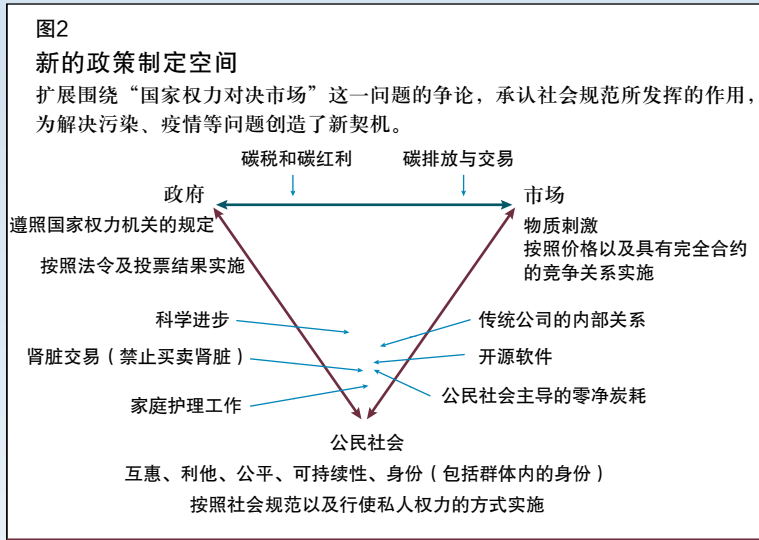
德·科斯 (Ronald Coase) 提出了一项著名的雇佣合同定义, 也即将工人的权力让渡给雇主。认可雇佣本身是一种权力转让的经济模式, 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框架, 借以解决社会不可或缺的低收入工人所面临的困境, 也就是迫使他们在生计和健康之间做出抉择。正因如此, 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 考虑到了雇主滥用私人权力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举措包括扩大工人在工作中的个人权利, 为待在家中的人提供政府救助, 尽量减少疫情蔓延。

新基准经济模式将经济学扩展成了一系列全新的内在驱动因素——保障社会正义、满足老百姓的尊严和表达诉求, 为政府开辟出了更加广泛的政策选择。新基准经济模式改变了游戏规则, 这些规则既可以通过市场、政府手段实现, 也可以通过行使私人权力、执行社会规范来实现。

以“碳税和碳红利”政策(政府为碳排放定价)和“碳排放与交易”政策(政府为碳排放量设定限额, 让市场定价)为例。如图2所示, 水平线上的不同位置表示不同国家的不同组合形式。每个国家利用不同的国家能力和市场机制组合来降低碳排放工作, 但这是一种一维连续的政策选项, 局限性很大。它假设私人参与者都掌握有充分的信息, 可以设计出足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或全球疫情等问题的机制。它的局限性会令政府错失机会, 无法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规范的力量中找到第三维度的解决方案。

图2阐述的政策, 综合了协同发挥作用(而非替代作用)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这三大因素的激励机制和执行机制。这些政策会落在三角形内部的多个点上。指向三角形中心的位置表示综合了这三种机制, 例如, 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生产、配发以及人口覆盖率(见图3)。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道德因素, 特别是在公平和团结问题上, 即使是陌生人之间, 也要考虑道德因素。社会上, 对谁应该优先注射疫苗、新冠疫情期间哪些工种不可或缺等问题争论不休, 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我们不能依靠价格体系或甚至按照政府命令来获取对我们至关重要的价值观。



新的经济学基准所扩展出的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这种分析框架将道德问题和适应世界的经济模式相结合, 在这种经济模式中, 人与人之间不仅依靠市场、合约, 还靠行使私人权力、病毒传播、对生物圈的影响、群体成员的纽带、关心公共利益等因素联系在一起。FD

塞缪尔·鲍尔斯 (SAMUEL BOWLES), 圣菲研究所行为科学项目的负责人。温迪·卡林 (WENDY CARLIN), 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家教授。两人都是 CORE 项目开放获取的导读本《经济学》《经济、社会与公共政策》的合著者。参见 www.core-econ.org。